

## 曾心儀小說中的女性性工作者研究\*

戴華萱\*\*

### 摘要

本文在梁欣芸的博士論文對臺灣當代妓女小說題材進行整體性研究的啟發下，再加上性別元素以深化議題。當研究者提出黃春明〈看海的日子〉、〈莎啞娜啦·再見〉都是奠基在男性中心意識的觀察，據此觀點進而企圖挖掘女性作家有別於男性作家對女性性工作者的關懷面向。本文以曾心儀九篇描寫女性性工作者的小說為研究範疇，得出三點發現。首先，曾心儀反對女性為了家庭經濟而成為性工作者，但不得不然者，則是女性自主的選擇，而非被迫或遭賣出，再現1970年代臺灣已逐漸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性商品化現象，同時也提出女性為家庭經濟犧牲的反思。其次，曾心儀關懷女性性工作者的主體性，描寫她們作為性工作者的矛盾心理、職業傷害等內在感受，以及離開性工作後所面臨的困境，立體細膩地揭示女性性工作者的形象與心境。最後，曾心儀從女性意識發聲，批判臺灣跨入美軍和日本度假觀光體系的跨種族男性同盟，並自國族寓言隱喻獨立自主的國族意識。本文正是以曾心儀小說中女性性工作者的題材為研究對象，指出女性

---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消失在國族隱喻和社會批判的女性主體——女性作家的娼妓書寫（1960s~1970s）」（計畫編號：MOST108-2410-H-156-006-）之部分成果。初次發表以〈娼妓文學的新視角——女性作家的娼妓書寫（1960s-1970s）〉為題，在「朝向台灣『新文學』：2019台灣文學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台灣文學學會、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共同主辦，2019年10月19日）宣讀，爾後再大幅度修改。投稿期間，承蒙兩位匿名委員給予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作家更關懷女性的主體意識，也隱隱開展出不同的國族寓言，藉此再現不同性別對於女性性工作者的書寫差異，進而達到對話、補充的目的。

關鍵詞：曾心儀、女性性工作者、性別意識、跨種族男性同盟、國族寓言

## 一、前言

在臺灣現代小說中，有一類專寫女性工作者題材的作品，<sup>1</sup> 令讀者最耳熟能詳的當是黃春明〈看海的日子〉的白梅莫屬：八歲被賣為養女、十四歲再賣入娼寮，正是臺灣清末以降的養女制度下，<sup>2</sup> 養女遭養父母變賣的雛妓典型。<sup>3</sup> 白梅雖淪為性工作者，但卻主導借精生子事件，返鄉待產期間，竟以救贖之姿奇蹟式地福佑家人與破解家鄉災厄，搖身一變為鄉里經營之神的聖女傳奇。自女性本身展現的人格特質，夏志清（1921-2013）就以為白梅表現了「人類的堅忍精神」，劉紹銘（1934-2023）則說白梅是一種自我超越。<sup>4</sup> 若從性別視角，王

<sup>1</sup> 梁欣芸在她的博士論文的附錄一中，就整理了自日治時期至 2013 年以臺灣妓女為題材的小說共 78 部作品，分別為：日治時期 11 篇，1945-1959 年 6 篇，1960 年代 14 篇，1970 年代 18 篇，1980 年代 20 篇，1990 年代 4 篇，2000-2013 年有 5 篇。見梁欣芸，《台灣當代妓女題材小說研究（1960s-1980s）》（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 年），頁 179-198。據此提出說明的是，在相關參考的文獻中，多將女性工作者稱為妓女、娼妓。然有鑑於妓女、娼妓的指稱在今日大多有負面意涵，故本文除引用及解釋文本時採用作者與研究者使用的詞彙（如：妓女、酒吧女、娼妓）外，本文行文將以「性工作者」一詞稱之。據何春蕤指出，「性工作」（sex work）一詞是美國妓權團體 COYOTE（Call Off Your Old Tired Ethics）的重要成員 Carol Leigh（1951-2022）在 1979 年妓權運動的抗爭中創造了「性工作」一詞。何春蕤，〈自我培力與專業操演：與台灣性工作者的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1 期（2001 年 3 月），頁 3。

<sup>2</sup> 臺灣自清末以來養女習俗產生的主因是為了分擔農村貧戶沉痾的養育重擔，原本立意良善的博愛之舉，卻因為養女被財產化與工具化而扭曲。謝康在〈臺灣養女和娼妓問題〉一文根據各種調查數據估算出養女出身之娼妓所占比例約為 20%-30%。詳見謝康，〈臺灣養女和娼妓問題〉，《賣淫制度與臺灣娼妓問題》（臺北：大風出版社，1972 年），頁 419。

<sup>3</sup> 據楊翠研究指出，大多娼妓自小就被賣給老鴇當養女，長到十二、三歲時便被迫接客，其生活苦不堪言。詳見楊翠，〈日據臺灣娼妓問題初探〉，《婦女研究通訊》第 32 期（1994 年 6 月），頁 7。

<sup>4</sup> 夏志清認為黃春明〈看海的日子〉表現了人類的堅忍精神以及對未來的美麗寄望，更進一步以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 1897-1962）比擬。夏志清，〈臺灣小說裏的兩個世界〉，《新文學的傳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9 年），頁 187-207。劉紹銘也說：「六十年代崛起的臺灣作家，在精神上繼承了三十年代寫實的傳統，但風格大異其趣……黃春

德威則指出在白梅從良故事看似「寫實」的外衣下，其真實蘊藏著男性意識的陳腔濫調：

「看海的日子」因而散播著母性救贖一切的神話，讓事畢拍拍屁股就走的嫖客在半自嘲的情況下，更可振振有辭的繼續「播種」……「看海的日子」似乎為不負責任的男人提供了另一種不在場的遁辭（alibi）。……黃春明在發揮人性（母性）的前提下，其實以極嘲弄的筆觸攪亂了男性中心閱讀規範的預設。……黃春明將整個奠基於男性中心意識的女性神話作了最高的禮讚，也同時加以「激進化」（radicalize）處理。<sup>5</sup>

王德威似意有所指，白梅得以被聖女神化，是立基在男性作為「播種者」的貢獻上；Rosemary Haddon 也提出相同觀點，他以為〈看海的日子〉呈現出男性中心論，故事最後以白梅一舉得男的歡樂結局彰顯父權框架的存在，無疑是服從傳統儒家社會對父系傳承的要求。<sup>6</sup> 即便是黃春明另一篇同樣以女性性工作者為題材的小說〈莎啞娜啦·再見〉，王德威也直指「該作在日本買春客與臺籍妓女間的形成的戲劇張力下，卻獨獨犧牲了對女性尊嚴的直接探討」，得出「黃春明所真

---

明『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歷盡滄桑，但以無比的意志力，以圖擺脫自己的命運，成為中國近代文學中少見的 self-transcending 人物。」見劉紹銘，《涕淚交零的現代中國文學》（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5。

<sup>5</sup> 王德威，〈尋找女主角的男作家：茅盾、朱西寧、黃春明、李喬〉，《聯合文學》第14卷第10期（1986年3月），頁35。

<sup>6</sup> Rosemary Haddon，〈拉皮條與順從：黃春明小說中被出賣的身體〉，收入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0年），頁428-432。此篇於2013年再被收入於李瑞騰、梁竣瓊編選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2：黃春明》輯四的「重要評論文章選刊」中。見李瑞騰、梁竣瓊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42：黃春明》（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年），頁242-269。

正關懷的也許仍然是一男性中心社會的顏面問題吧」的結論。<sup>7</sup> 謝世宗也自男性具有相同情慾的彼此認同，指出黃春明在〈莎啞娜啦·再見〉揭示男性潛意識都存在的假陽具艷羨。<sup>8</sup> 〈莎啞娜啦·再見〉關懷女性工作者的問題顯然不同於〈看海的日子〉，前者是臺灣男性黃君奉命帶日本嫖客到礁溪買春的故事，敘述重點放在黃君不得不拉皮條的心理轉折過程，女性工作者的心聲完全被消音，由此帶出臺灣女性工作者和宛如去勢的黃君作為被殖民的隱喻。<sup>9</sup> 後者雖以女性為敘述主體，但女性之所以得以聖女化，關鍵在於男性嫖客供應精子始得以實現聖女傳奇：我以為這是研究者提出黃春明在這兩篇小說中深具男性意識的原因所在。

這些研究者雖然凸顯黃春明作為男性作家具備男性意識的論點，但卻沒有進一步以具代表性的女性作家為觀察對象，深入探討女性作家這類題材的創作特色，因此無從得知女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工作者是否較男性作家更理所當然的具有女性意識，十分可惜。據此，男女作家是否書寫不同女性工作者的特質，便引起我極大的好奇，尤其王德威在該文中同時指出：「對熱衷女權的學者而言，男作家作品有關女性部份的陳述如若不是越俎代庖，便是隔靴搔癢，不能透達女性的『真』象。」<sup>10</sup> 再自十七世紀女權主義者德·拉·巴爾（François Poullain de la Barre, 1647-1723）所謂：「制定法律、編撰法律的都是男

<sup>7</sup> 王德威，〈尋找女主角的男作家：茅盾、朱西寧、黃春明、李喬〉，頁 34。

<sup>8</sup> 謝世宗，〈女性化主義與男性氣質的多重面向：臺灣鄉土小說中的慾望經濟學〉，《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新北：群學出版社，2019 年），頁 55。

<sup>9</sup> 邱貴芬認為，故事不斷強調七名日本嫖客的男性位置，點出殖民行為隱含的性別架構，而被殖民男人在殖民壓迫結構裡喪失權力，眼睁睁看著自己國家的土地、女人認殖民者揮刀直入後，恐怕在「失勢」之後，唯有「去勢」的命運。見邱貴芬，〈性別／權力／殖民論述：鄉土文學中的去勢男人〉，《仲介台灣·女人》（臺北：元尊文化，1997 年），頁 187-188。

<sup>10</sup> 王德威，〈尋找女主角的男作家：茅盾、朱西寧、黃春明、李喬〉，頁 38。

人，他們採取的都是對自己的性別有利的立場」，<sup>11</sup> 由此引起我思索的是：若是理解女性性工作者的境遇來自女性作家，女作家關注的又是什麼？

臺灣女作家書寫以女性性工作者為題材的小說，當以曾心儀居冠，共有九篇，寫於 1976 至 1979 年間。<sup>12</sup> 自 1965 年臺灣被納入美軍休息復原計畫（R&R, Rest and Recuperation program）後，<sup>13</sup> 作為度假中心之一的臺灣遂投入跨國性服務的貿易體系，曾心儀就多以越戰時期的臺灣酒吧為故事場域，酒店裡服務的酒吧女幾乎都有被美軍「帶出場」進行性交易以賺取較高額渡夜資的情節，<sup>14</sup> 相應於當時「駐台美軍特別調查處」副處長韋特明先生說的：「美軍來台渡假就是為了女人跟酒」，<sup>15</sup> 而曾心儀筆下的這群酒吧女正是當時服務美軍的主要性工作者。可惜的是，曾心儀這一系列的作品至今幾乎未被深入討論。謝世宗《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的研究範疇為 1970 年代的鄉土文學，在導論中雖已指出曾心儀值得關注，但囿限於篇幅，還是優先處理黃春明、王禎和（1940-1990）、陳映真（1937-2016）、王拓（1944-2016）與楊青矗這五位男

<sup>11</sup> [法]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邱瑞鑾譯，《第二性》（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3 年），頁 58。

<sup>12</sup> 詳見附錄一。

<sup>13</sup> 當時為「反共陣線」之一的臺灣，除了出兵協助南越打擊共產勢力之外，更在 1965 年被美國國防部指定為駐越美軍「休息復原計畫」度假地區之一（R&R, Rest and Relaxation），由「中美聯合小組」與執行小組來接待美軍來臺度假。見殷寶寧，《情欲·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臺北：左岸文化，2006 年），頁 93。

<sup>14</sup> 如曾心儀〈從大溪來的少女〉：「還會不搞嗎？水兵，又是好幾個月不見了。」〈酒吧間的許偉〉：「這鬼子真可惡！真可怕！一去他房間，他就要搞，動作粗魯、惡劣，搞了還要再搞」；〈烏來的公主〉：「我碰過一個客，人我向他討小費一千塊臺幣，他已經熱起來了，臉手發燙，急著要辦事」。以上分見曾心儀，〈從大溪來的少女〉，《我愛博士》（臺北：遠景出版社，1977 年），頁 3；〈酒吧間的許偉〉，頁 35-36；〈烏來的公主〉，頁 185。

<sup>15</sup> 鍾俊陞，〈台灣的娼婦經濟——戰爭色情與貿易色情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人間雜誌》第 37 期（1988 年 11 月），頁 73。

性作家，<sup>16</sup> 將曾心儀暫時擱置未論。被彭瑞金稱為「弱勢族群代言人」的曾心儀，<sup>17</sup> 確實是有意識的要以創作揭露底層人民的生活與社會現況：

對於小說是否有助於社會改革這個問題，我個人以為，答案是肯定的。用小說的形式，描寫現實各階層人物的生活，至少幫助大家了解不同階層的人所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由了解到工人、漁民生活的困苦，而策力去改善。<sup>18</sup>

曾心儀的創作信念，十分切合 1970 年代反映臺灣現實社會動向、描寫並企圖改革人民真實生活的文學主張。但可惜的是，同樣都有寫女性工作者的小說，且曾心儀的九篇並不亞於男性作家的創作量，<sup>19</sup> 然目前進入文學史經典和評論焦點的幾乎都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梁欣芸在 2014 年的博士論文整理出臺灣自日治迄 2013 年以妓女為題材的小說，確實創作者不少，數量也頗多，但她指出研究者卻多只關注少數作家，如李喬、黃春明、王禎和的妓女書寫，因此針對 1960 年至 1980 年以妓女為題材的小說提出整體性的討論，<sup>20</sup> 本文也就在梁

<sup>16</sup> 謝世宗，〈國族、性別與資本主義的三元辯證〉，《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頁 29-30。

<sup>17</sup>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年），頁 187。

<sup>18</sup> 曾心儀，〈生活隨筆（代自序）〉，《等》（臺北：四季出版事業公司，1981 年），頁 6。

<sup>19</sup> 根據梁欣芸統計，1960 至 1980 年代發表以娼妓為題材的小說，李喬有 8 篇，葉石濤（1925-2008）有 6 篇，王禎和有 4 篇，黃春明有 3 篇。詳見梁欣芸，《台灣當代妓女題材小說研究（1960s-1980s）》，「附錄一」，頁 179-198。

<sup>20</sup> 根據梁欣芸統計，日治時期有 11 篇，戰後 1945-1959 有 6 篇，1960 年代有 14 篇，1970 年代 18 篇，1980 年代 20 篇，1990 年代 4 篇，2000 年後 5 篇。若以梁欣芸研究的 1960 至 1980 年代為範疇，出現的作家有：李喬、王禎和、葉石濤、陳映真、許希哲、黃春明、白先勇、季季、楊青矗、王默人（1934-2020）、鄭清文（1932-2017）、陳恆嘉（1944-2009）、張大春、曾心儀、朱天心、廖蕾夫（1951-2008）、鍾延豪（1953-1985）、李昂、黃凡、蕭颯、荻宜、廖輝英、履疆、鄭俊清、朱天文、吳錦發、黃有德、林剪雲。見梁欣芸，《台灣當代妓女題材小說研究（1960s-1980s）》，頁 3；179-198。

欣芸觀察的啟發下，再加上性別元素以深化此議題。邱貴芬就說「『鄉土文學』這一個通常用來代表 1970 年代臺灣文學的斷裂分法無法形容 1970 年代臺灣女作家小說的活動情況。」據此指出「文學斷代所隱藏的『男性』史觀位置於是暴露無遺」的事實。<sup>21</sup> 那麼，當文學史對女性性工作者的理解都來自單一的性別訊息，也就只能在男性意識中心下解析出單一性別面向：「妓女／被殖民者」、「施暴者／殖民者」的國族寓言，<sup>22</sup> 抑是「生產者／消費者」的資本主義寓言，<sup>23</sup> 這些純然從寓言解析的評述，讓女性性工作者只是形構寓言的中介，主體性完全被消音。而我以為唯有當不同性別的書寫產生對話或互補時，關照面向才能更多元全面，不會淪為單一的性別聲音，甚至還能達到凸顯女性主體的觀察。因此，本文就以曾心儀的這九篇小說為研究範疇，提出女性作家對女性性工作者的關懷，究竟開展了哪些面向與特質？再者，向來關心社會現實、國家發展的曾心儀，是否也有以女性性工作者為隱喻的國族寓言？倘若有，是否有別於男性作家？而為了凸顯作為女性作家的曾心儀書寫女性性工作者的特色，本文將適時援引同時期男性的經典代表作：黃春明的〈莎啞娜啦·再見〉、

<sup>21</sup> 邱貴芬，《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臺北：女書文化事業公司，2001年），上冊，頁12。

<sup>22</sup> 以李喬小說為研究者詳見以下兩者：邱如君，《李喬《藍彩霞的春天》中娼妓形象與反抗哲學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黃小民，《歷史的謊言·鄉土的真實——李喬小說創作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這兩本論文均將《藍彩霞的春天》放在李喬的「反抗哲學」中論其國族寓言。以王禎和小說為研究者可見以下碩士論文與一篇歷時研究的期刊文獻：陳怡臻，《笑的力量——論王禎和《美人圖》與《玫瑰玫瑰我愛你》中的鬧劇書寫》（臺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劉至瑜，〈臺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以呂赫若〈冬夜〉、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李喬《藍彩霞的春天》為例〉，《臺灣人文》第4期（2000年6月），頁1-20。

<sup>23</sup> 謝世宗，〈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臺灣社會顯微：重讀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頁167-207。

〈小寡婦〉及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作為參照比較的基準。<sup>24</sup> 然囿限於篇幅，且有鑑於這三篇小說的相關研究已十分豐碩，本文無須續貂，故不再詳細論析，僅在必要處作為比較的參照點。

## 二、關懷女性性工作者的主體性

向來描寫性工作者題材的作品，多是以年輕貌美、身材姣好的女性為主角。<sup>25</sup> 但例外的是，曾心儀小說中那群服務美軍的酒吧女幾乎沒有太出色的外貌，甚至還較中人之姿更略遜一籌：

在越戰進行得激烈之時，當我們走在鬧區，不時地瞥見一些直長頭髮的少女，臉上抹著粗俗脂粉，衣飾不甚調和，衣服包裹的是豐潤、結實，流露著農村人勞動的拙樸的體格……凱琳給人的印象，就是那種「過時」的「俗氣」。<sup>26</sup>

露西又瘦又小，臉只有一般女子 2/3 弱大。短短的頭髮，小耳朵下搖幌著過時式樣的耳環。幸好她的眼睛、鼻子、嘴巴長得不大不小，沒有特別顯眼的缺陷。<sup>27</sup>

---

<sup>24</sup> 《玫瑰玫瑰我愛你》雖寫於 1984 年，但倘若以王禎和自述：「一、二十年來我一直想寫這小說，記得越南美軍第一次搭軍艦到花蓮度假，全花蓮市都忙碌起來……從那時起，我就想把這小城一大事寫出來，寫了幾次都沒寫成，直到這一回」可知，王禎和開始動筆的時間也是在 1960 年至 1970 年間，且是以 1970 年代美軍來臺度假為主題的代表性作品。丘彥明，〈把歡笑撒滿人間——訪小說家王禎和〉，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臺北：洪範書店，1994 年），頁 255。

<sup>25</sup> 如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在挑選吧女時就開出「年紀要像花、面貌要像花，而且身子也要像花」、「都在一五五公分以上」、「都有兩粒文旦奶」的外在條件。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86、95。

<sup>26</sup> 曾心儀，〈從大溪來的少女〉，《我愛博士》，頁 1-2。

<sup>27</sup> 曾心儀，〈烏來的公主〉，《我愛博士》，頁 184。

這些女性性工作者既不是妙齡美女，長相甚至比一般女性還要劣質。外貌上或是過時的俗氣，或僅是沒有明顯缺陷的五官，與美麗完全沾不上邊。年齡上不是未諳性事的未成年少女，如〈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中的高中輟學生翠華、魏淑敏、小芬，〈朱麗特別的一夜〉中未滿十八歲的朱麗；就是已育有小孩的中年婦女，如〈從大溪來的少女〉的凱琳、〈閣樓裡的女人〉的愛娜，她們幾乎都顛覆了傳統女性性工作者妙齡技佳的特質。在 R&R 計畫的眾多國家中，美軍多選擇臺灣度假的理由是「中國小姐的漂亮在越南美軍裡享有盛名」，<sup>28</sup> 那麼可想見這些不年輕美麗的酒吧女當然不會有夜夜高朋滿座的酒客，也就勢必得為收入苦惱。從她描述露西「這樣長相、外型，怎麼能做歡場生意呢」，<sup>29</sup> 以及「貌美容易出場的先做客人。為了後點，露西常常敬陪末座」，<sup>30</sup> 曾心儀顯然不是不知道必須賦予女性性工作者美貌的重要性。王津平就指出曾心儀創作的獨特性是「深入探觸到了社會陰僻一角，較為人所漠視的人物」，<sup>31</sup> 可見曾心儀是有意識的以這群不具天生麗質的邊緣酒吧女作為她關注弱勢的對象。若再歸納這群外貌不出眾者，多原居住偏鄉或是南部，教育程度不高，其中有些具有原住民身分，<sup>32</sup> 普遍家庭經濟困頓，顯見曾心儀關懷的，是女性性

<sup>28</sup> 被納入 R&R 計畫中的國家有：夏威夷、泰國、馬來西亞、日本、菲律賓、香港。鍾俊陞，〈台灣的娼婦經濟——戰爭色情與貿易色情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頁 73-74。

<sup>29</sup> 曾心儀，〈閣樓裏的女人〉，《我愛博士》，頁 183。

<sup>30</sup> 曾心儀，〈烏來的公主〉，《我愛博士》，頁 197。

<sup>31</sup> 王津平，〈面對嚴肅的現實問題，高揚批判的道德勇氣——「我愛博士」代序〉，見曾心儀，《我愛博士》，頁 1。

<sup>32</sup> 〈閣樓裏的女人〉：「這批新小姐裏有幾位是山地人。」〈烏來的公主〉：「（露西）我是烏來山地人。」以上分見曾心儀，〈閣樓裏的女人〉，《我愛博士》，頁 82；〈烏來的公主〉，頁 184。對於原住民女性淪為性工作者，排灣族詩人莫那能就曾講述妹妹在表姊夫與西部平地人勾結下，被賣到高雄的私娼寮，受盡凌虐的親身遭遇。詳見莫那能口述，劉孟宜錄音整理，呂正惠編輯校訂，《一個台灣原住民的經歷》（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 年），頁 131-157。另，黃春明在他所寫的《我的名字叫蓮花》也論及雛妓的問題，並對於原住民少女淪為妓女的

工作者中最屈居弱勢的邊緣者。

曾心儀也確實坦言，促使她關注女性性工作者的原因，是希望能夠透過創作發揮勸阻的功用：

多年來，我看到我周圍太多的少女毅然放棄追求個人的幸福，為了解決她們家境的貧困，淪落風塵。基於我對風塵女郎生涯的了解，我堅定地認為，她們的犧牲是一個殘忍的悲劇，只能救一時之急，卻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她們的犧牲所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大到令我說：不值得！我絕對反對為經濟問題作這樣的抉擇。<sup>33</sup>

劉毓秀自佛洛伊德（Sigmund Schlomo Freud, 1856-1939）的意識與潛意識說指出，這些不利女性的父權環境，將大幅度擴張自心靈層面，讓這些遭遇家庭解組、謀生不易的女性萌生根深蒂固為家庭犧牲的信念，<sup>34</sup> 也就是內化臺灣自清領以來父權結構（男／女，尊／卑，主／從，擁有者／物件）的社會現實。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中那位拉皮條的黃姓職員也說「以我所知道，那些女人沒有一個是自甘墮落的，她們都是環境所迫，為整個家庭犧牲」，<sup>35</sup> 顯見作家不分性別，都觀察到 1970 年代的女性成為性工作者往往是為家庭犧牲的現象。

而曾心儀為這些犧牲自我的女性擔憂並大呼不值得，是她發現女性性工作者若選擇離職，重回現實社會後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是她構思醞釀十年的題材，這一短篇就描寫高中

---

遭遇，則指出是漢人社會結構暴力的一種。魏可風專訪，〈黃春明答客問〉，《聯合文學》第 118 期（1994 年 8 月），頁 83-84。

<sup>33</sup> 曾心儀，〈我的寫作過程——《我愛博士》自序〉，《我愛博士》，頁 12。

<sup>34</sup> 劉毓秀，〈後現代性產業的慾望機制，及其與後現代及後期資本主義的關聯〉，《中外文學》第 31 卷第 2 期（2002 年 7 月），頁 39-67。

<sup>35</sup> 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莎啞娜啦·再見》（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4 年），頁 16。

肄業的黎女還清家中負債後決定離開歌舞昇華的夜生活，但從良後的她不僅被校長拒絕重新入學的申請，婚後也遭公婆唾棄嫌惡，都是因為得知她曾是女性工作者的事實：

重新做人多麼難，前功盡棄，他們不在意妳向上，要學好，不在意妳心良善，他們只是輕視！輕視！把所有人的狹窄，私心全堆築在妳的壞紀錄上。他們毫不設想當年妳淪落的壓力，用心良苦。啊，永遠，永遠忘不了此刻身心所受的侮辱，痛苦！<sup>36</sup>

最後，在媽寶丈夫與公婆同聲一氣的絕望下，身懷六甲的黎女做出離開夫家的決定。這仿若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的情節，<sup>37</sup> 曾心儀也將結局停格在黎女「一步托一步往前走」的畫面，黎女日後或如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揭示娜拉「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兩種選擇。<sup>38</sup> 曾心儀指出女性工作者欲重返社會的諸多困境，反對女性為一肩挑起家庭經濟而選擇自我犧牲的行徑。

曾心儀記錄下這些社會檔案，也某種程度呼應施淑所謂「在台灣女性主義運動剛萌芽的時候」。<sup>39</sup> 回溯臺灣戰後女權運動的第一波，始自 1971 年呂秀蓮於哈佛大學畢業回臺後推介女性主義，率先提出「先做人，再做女人或男人」的主張，對女性意識的拓荒有推波助瀾之效。論及「風化問題」，呂秀蓮反對的是性別不對等的妓女制度，她認為這樣的制度無疑將女性人格物化，只是男人洩慾的工具，是侮蔑人性、違反人道的。<sup>40</sup> 呂秀蓮除了檢討當時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制度

<sup>36</sup> 曾心儀，〈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我愛博士》，頁 151。

<sup>37</sup> 〔挪威〕易卜生（Henrik Ibsen）著，劉森堯譯，《玩偶之家》（臺北：書林出版社，2006 年）。

<sup>38</sup>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墳》（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9 年），頁 176-177。

<sup>39</sup> 施淑，〈愛麗絲遊記——曾心儀集序〉，見曾心儀著，施淑、高天生主編，《曾心儀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11。

<sup>40</sup> 以上分見呂秀蓮，《新女性主義》（高雄：敦理出版社，1986 年），頁 147-157、178-180。

外，更希望外界能對那些為了家庭犧牲而不得已淪落風塵的女性給予同情，曾心儀也提出同樣的反思：

凱琳身心承受屈辱，賺錢幫助家裏，養女兒。人們看見吧女和洋人牽著手走，投給她浮光掠影傳統、道德對她的卑視和冷酷；是否能透視到她真實生活的相貌呢？<sup>41</sup>

傳統道德對女性性工作者的卑視，或可溯源自北宋理學家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儒家貞操觀，<sup>42</sup> 但弔詭的是，倘若沒有男性的買春，何來女性性工作者的賣淫？雖然曾心儀反對女性為了承擔家庭經濟而成為性工作者，不過，對於這群仍決定自我犧牲的女性，曾心儀更關懷的是，在以貞節觀審視這群女性性工作者之際，似乎更應關心她們背後各種不為人知的故事；尤其她曾自述「我寫小說，都是從現實中取材，寫我所熟悉的事，幾乎沒有過憑空設想」。<sup>43</sup> 她在〈烏來的公主〉開篇，就以後設的筆法說「我請你們公主，暫拋去榮譽的包袱，用您們的愛心和同情設法了解她坎坷的經歷」、「噢，不要輕視卑微社會地位的人」，<sup>44</sup> 正是表達出這些女性性工作者在支撐家庭經濟的考量下，選擇以自己的身體資本交換她們獨立養家的夢想，我以為曾心儀想傳達的是對於這些為了家庭犧牲而成為女性性工作的弱勢邊緣者，不應該受到卑視的眼光與待遇。

一旦這些女性已成為性工作者，曾心儀則描寫是她們自主的選擇，而不是黃春明筆下的白梅被當作商品賣入娼寮，某種程度反映了

<sup>41</sup> 曾心儀，〈從大溪來的少女〉，《我愛博士》，頁7。

<sup>42</sup> 二程〈遺書〉中有言：「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見〔明〕程頤、〔明〕程顥，〈遺書〉，《二程全書》（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冊1，卷22下，頁3。

<sup>43</sup> 曾心儀，〈自序〉，《那群青春的女孩》（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2。

<sup>44</sup> 曾心儀，〈烏來的公主〉，《我愛博士》，頁183。

1970 年代的女性性工作者逐漸將性視為商品的社會現象。來自大溪的凱琳說：「我還要養孩子，賺錢不夠用。那時，我的幾個鄰居有在酒家和酒吧上班，我就跟她們跑」；<sup>45</sup> 烏來的公主直言自己是家人的銀行，在遭受丈夫虐待後，決定「我要靠自己，我要再出來上班」；<sup>46</sup> 〈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的黎家長女眼見家人貧病交迫而欠下巨款，即便父母反對，仍選擇中輟學業而下海，施淑曾分析曾心儀這類創作的信念：

七〇年代末的台北，沒有飛沙走石，也沒有自己的姓名，生息在陽光之外的烏來公主、彩鳳、愛娜，像夢遊的愛麗絲，穿梭在壁飾裝潢間，在機器複製了的自然裏，從一個飯店到另一個飯店。她們相信可以交換一切的錢，這個最激進的平等主義者，能為失去一切的自己交換來自己失去的一切，最好是名字本身就保證著美好生活的美國。<sup>47</sup>

從事性工作的女性遊走於飯店間，她們相信是以自己的身體交換期待的所得，在她們看來是一種公平交易，也就是施淑所謂「最激進的平等主義」。張家銘研究指出，投資報酬率極高是吸引從業女性入行的最大原因，不但賺的錢多且快，對於急用者而言，確是一種相當好的賺錢方式。<sup>48</sup> 因此，在臺灣逐漸資本化的七〇年代，願意扛下家中經濟重擔的她們就選擇「用金錢購買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sup>49</sup> 曾心儀筆下的女性仍覺得成為性工作者是恥辱不光彩的，且多厭惡與尋歡男

<sup>45</sup> 曾心儀，〈從大溪來的少女〉，《我愛博士》，頁 5。

<sup>46</sup> 曾心儀，〈烏來的公主〉，《我愛博士》，頁 194。

<sup>47</sup> 施淑，〈愛麗絲遊記——曾心儀集序〉，見曾心儀著，施淑、高天生主編，《曾心儀集》，頁 11。

<sup>48</sup> 張家銘，〈色情現象與生活世界：一個分析類型的提出及其意義〉，《思與言》第 33 卷第 3 期（1995 年 9 月），頁 1-26。

<sup>49</sup> 曾心儀，〈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我愛博士》，頁 112。

性的性接觸，尤其還要冒著可能致病或懷孕的風險；但在經濟考量下，只能透過心境轉化，將性工作者視為眾多職業中的一種，是女性考量後的自我選擇。而對於「性工作到底是不是一種工作或職業」的爭議，丁乃非指出美國早在 1970 到 1980 年代就已經展開討論，在 1984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伯納女子學院的一場會議達到高峰；<sup>50</sup> 而臺灣一直到 1990 年代才開始有關女性身體與情慾自主的書寫論述，於 1997 年臺北市取消公娼執照時引發兩派女性主義陣營分歧的激烈攻防戰。<sup>51</sup> 反廢娼的婦女團體代表何春蕤透過與臺灣性工作者的對話，提出「性作為女性的一種工作權利」的主張，<sup>52</sup> 尤其在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化分工與商品化的趨勢和特性下，性的商品化、專業化是很自然的發展。<sup>53</sup> 支持廢娼的另一方，如林芳玫就認為「性工作權」是一種荒謬的講法，性產業是對女性的剝削。<sup>54</sup> 不過，林芳玫也提出「婦女團體關於廢娼與否的看法，當然不可能簡單地化約為支持與反對的兩極，更非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sup>55</sup> 由此審視曾心儀於存廢兩派尚未發展成熟的 1970 年代的主張，自然無法以完全贊成或反對截然二分。本質上反對女性從事性工作的曾心儀，當她發現身邊女性幾乎都是為了家庭經濟

<sup>50</sup> 丁乃非著，黃道明譯，〈成者為妻，敗者妾妓——婚姻轉型與女權演化〉，《中外文學》第 49 卷第 4 期（2002 年 12 月），頁 224。

<sup>51</sup> 林芳玫，〈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第 27 卷第 1 期（1998 年 6 月），頁 62-63。

<sup>52</sup> 何春蕤，〈自我培力與專業操演：與台灣性工作者的對話〉，頁 1-51。

<sup>53</sup> 何春蕤，〈女性主義的色情／性工作立場〉，收入何春蕤主編，《性工作：妓權觀點》（臺北：巨流出版社，2001 年），頁 235-236。

<sup>54</sup> 林芳玫細述「台北公娼抗爭大事記」的始末，主要指出由新知、女線、粉領的反廢娼主張，是一種個人主義式、行為主義式的性解放論述，將性工作視為身體勞動的一種；另一方（婦援會、勵馨、女權會、彭婉如基金會）的論述框架是產業與男性欲望的社會建構，女性身為性工作者，無論是受害者還是有尊嚴的行動主體，都不能翻轉性產業中性別位置的配置。林芳玫，〈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頁 56-87。

<sup>55</sup> 林芳玫，〈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頁 57。

才選擇成為性工作者，因此展現在她筆下的女性性工作者已不再是被交易的商品，而是出於女性主體具自主意志選擇的論調。

一旦女性性工作者的經濟條件開始改善，也就伴隨愈來愈好的物質生活，〈烏來的公主〉就道出女性因為選擇當酒吧女而得以享有高級物質生活的好心情：

碰到好客人，我們位是過得很好啊。我們可以去大飯店吃牛排，我妹妹和妹夫雖然比我神氣他們就吃不起牛排。我們還可以去各大飯店、小飯店住。豪華的場面也見識過。<sup>56</sup>

曾心儀不一味聚焦在女性性工作者的受辱感與哀怨痛苦，而是更致力描摹她們的矛盾複雜心態：既討厭從事性交易，卻又樂於享受高消費物質。承繼父親成為皮條客的許偉，曾心儀就安排他觀察吧女們雖然憎厭性工作，但「卻又受著都市物質文明的引誘，追趕時髦，添衣服、化妝品、手飾」；<sup>57</sup> 朱麗更直言到酒店上班是因為工作輕鬆且高收入，才能「逛街、買喜歡的東西、看電影、到郊外觀光區夜宿」，<sup>58</sup> 可說是反映了 1970 年代資本主義化後的臺灣逐漸耽溺物質的現況。這在西方的研究結果亦然，桑格發現在紐約 2000 名女性性工作者中有 933 人之前從事家政服務，而女僕成為性工作者的根本原因是經濟上的。「女僕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職業，她想要時髦的衣服、品嚐快樂生活的機會，她就會雙腳跳起來抓住這個機會。」<sup>59</sup> 在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下，女性即便不喜歡從事性交易，但已經可以合理的將性工作視為一種賺錢的職業，〈朱麗特別的一夜〉中的朱麗就說「為什麼我不能

<sup>56</sup> 曾心儀，〈烏來的公主〉，《我愛博士》，頁 188。

<sup>57</sup> 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我愛博士》，頁 31。

<sup>58</sup> 曾心儀，〈朱麗特別的一夜〉，《等》，頁 138。

<sup>59</sup> 引自〔英〕喬治·萊利·斯科特（George Ryley Scott）著，秦傳安譯，《文明的陰暗面：娼妓與西方社會》（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年），頁 22。

做個賺錢多、又不很辛勞的工作？」<sup>60</sup> 隱地在評論曾心儀筆下的酒吧女形象時就指出：「最高明處是使她游移於善惡兩動機之間。有了錢，可以盡孝，是一種想法，有了錢，可以享受，是另一種想法，兩種動機同樣強烈，同樣不可抗拒。」<sup>61</sup> 可見曾心儀生動勾勒出女性選擇性工作時的矛盾心理，甚至更凸顯她們因此得以脫貧享樂的喜悅感，揭示出更立體細膩的形象，有別於黃春明與王禎和的小說「寄意不在娼妓身上。作者別有用心，娼妓的戲份在小說裡就受到限制，形象就難免扁平」，<sup>62</sup> 顯見曾心儀確實較男性作家更關懷女性性工作者的內在感受與心理狀態。

對於這些已經成為性工作者的女性，除了矛盾的兩難心境外，曾心儀更詳盡描摹她們遇到的種種問題與心情。在她的小說中就出現嗑迷幻藥的酒吧女，如〈酒吧間的許偉〉的芳芳、〈閣樓裏的女人〉的伊娃，這是因為在越南參戰的美軍一旦上戰場隨時有死亡的可能，因此多吸食大麻等毒品麻痺自己，當臺灣成為美軍度假樂園的首選，為了迎合美軍，大宗大即便被進口到臺灣，色情業和販毒者相互勾結，不少酒吧女因此染上抽大麻菸、吸食迷幻藥的毒癮。<sup>63</sup> 在曾心儀筆下，關心的是她們藥性發作時「又哭又鬧，肌肉僵硬了，眼光呆滯，只是眼淚鼻涕縱流，躲在牆角呼喚媽媽」的不穩定情緒，<sup>64</sup> 再加上因毒品上癮的花費，讓酒吧女的經濟更捉襟見肘，無疑是走上身心交迫的困境。

再者，專門服務美軍者也常被傳染性病，曾心儀就描寫她們染病後的身體變化及感受：

<sup>60</sup> 曾心儀，〈朱麗特別的一夜〉，《等》，頁 142。

<sup>61</sup> 隱地，《六十六年短篇小說選》（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 年），頁 264。

<sup>62</sup> 高全之，〈平等與同情——王禎和／黃春明小說的娼妓態度〉，《王禎和的小說世界》（臺北：三民書局，1997 年），頁 93。

<sup>63</sup> 柯瑞明，《臺灣可以說不》（臺北：業強出版社，1996 年），頁 32。

<sup>64</sup> 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我愛博士》，頁 32。

我昨晚坐在沙發上等客人。怎麼覺得下面很癢。全身不舒服，在發抖。實在不能忍受，就跟會計借錢去看醫生。我先上廁所，用小鏡子照怎麼看到脫皮了。把它拿近看，啊呀嚇死人了，怎麼是隻小白蟲。我到醫院，醫生說，我是被男人傳染的，只要把陰毛全部剃掉，蟲不能寄生，就好了。……他媽的，不知道是哪個鬼子傳染給我的。聽說是一種蚤蟲。我從來不知道有這種病！我一向是很愛乾淨的，我上班這麼多年，這是第二次得病。<sup>65</sup>

鬼子是對美軍的暱稱，雖然沒有說出醫師診斷的病名，但在女性私密處發現蟲，必然是性病的一種。曾心儀極其赤裸地描寫女性性工作者得知染病後的心情、症狀與不舒服感受，以及必須將陰毛剃光的治療方式。其次，對於性交易時時可能導致的懷孕風險，她們多選擇吃避孕藥，導致「月經越來越少，都快乾了」。若不小心受孕，則必須找密醫墮胎，承受緊張痛苦的高風險，手術過後如果平安，就要休息，吃些豬肝、燉雞之類的補品；如果不幸手術失敗，就可能患月經失調等病症，<sup>66</sup> 道出墮胎的風險與後遺症。如來自大溪的女孩就因墮胎引發無法根治的風濕性關節炎，除了必須長期貼藥膏、看跌打損傷外，一旦變天，腿骨的痠痛更酷厲地折磨她。萬一女性性工作者選擇產下混血兒，也就只能靠自己養活遺腹子，不僅無法陪伴成長，也造成經濟負擔更加劇的惡性循環。曾心儀自女性性工作者的視角道出種種職業傷害及其感受，這顯然很不同於男性作家，Rosemary Haddon 就指出黃春明在〈小寡婦〉中精彩的上演種種謔仿、假扮與鬧劇，但女性性工作者的心聲卻都無人問津，<sup>67</sup> 顯見女性作家確實較關懷女性性工

<sup>65</sup> 曾心儀，〈烏來的公主〉，《我愛博士》，頁 195-196。

<sup>66</sup> 曾心儀，〈閣樓裏的女人〉，《我愛博士》，頁 86-87。

<sup>67</sup> Rosemary Haddon，〈拉皮條與順從：黃春明小說中被出賣的身體〉，收入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48。

作遭逢身心困頓的主體性問題。

### 三、批判跨種族男性同盟

1970 年代以女性性工作者為題的文學風貌之所以殊異，在於 1965 年後美軍介入越戰後以臺灣為度假中心，以及 1970 年後日本觀光買春團的風行，<sup>68</sup> 加入美國大兵和日本觀光客的跨國嫖客陣容。尤其美方每周均有免費的度假班機和船艦從越南接送大批美國大兵來臺，港口附近商店為了發難得的戰爭財，紛紛變相經營色情行業，<sup>69</sup> 將臺灣迅速推入跨國性服務的貿易觀光體系。曾心儀九篇以酒吧女為題的小說，再現了臺灣當時幾乎每一家 BAR 都有美軍的盛況，黃春明〈小寡婦〉與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就是描寫美國大兵來臺度假的經典作。〈小寡婦〉設定在 1968 年，《玫瑰玫瑰我愛你》是 1972 年，<sup>70</sup> 都是美軍大量來臺度假之際，<sup>71</sup> 兩篇小說不約而同地將重點放在行銷策略上：由男性知識份子絞盡腦汁獻出經營理念，以販賣臺灣女性性工作者特有風情的新奇感，「要主動地把老美吸過來」、「錢也要賺得比以前的方式更多」，<sup>72</sup> 極具創意戲謔地展演如何汲汲營營於發一筆跨國色情財的故事，朱惠足就以為〈小寡婦〉中「馬經理精心

<sup>68</sup> 鍾俊陞，〈台灣的娼婦經濟——戰爭色情與貿易色情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頁 76。

<sup>69</sup> 柯瑞明，《臺灣可以說不》，頁 28。

<sup>70</sup> 由阿粉看的電視劇「西螺七劍」可推知，王禎和乃將時間設定在 1972 年美軍大量來臺度假之際。因「西螺七劍」是臺灣中華電視公司，在 1972 年 3 月 7 日至 10 月 13 日期間所播出的帶狀午間連續劇。陳燦坤，〈打響西螺七崁，頭崁高鳴過世武術界惋惜〉，《自由時報》（中部地方版），2017 年 2 月 7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76108>，瀏覽日期：2022 年 1 月 28 日。

<sup>71</sup> 根據統計，1967 至 1970 年間臺灣共接待美軍 170311 人，1970 年代初期估計有 20 萬美軍來臺。鍾俊陞，〈台灣的娼婦經濟——戰爭色情與貿易色情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頁 73。

<sup>72</sup> 黃春明，〈小寡婦〉，《看海的日子》（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4 年），頁 160。

設計的『中國小寡婦』形象，呈現出台灣在地男性與美軍形成跨種族男性同盟」。<sup>73</sup> 謝世宗更詳盡指出這兩篇小說的男性經營者以新觀念活化舊產業，表現了資本主義理性計算的精神，目的無非是希望吸引更多的美軍前來消費，以追求資本主義市場運作下的最大利潤，<sup>74</sup> 是從經濟面對跨種族男性同盟的深度詮釋。倘若再由《玫瑰玫瑰我愛你》中酒吧女的學習效果未達預期，男性經營者動輒以「笨蛋」、「蠢豬」、「Idiot」、「Block head」的父權之姿怒罵之，<sup>75</sup> 顯見本國男性經營者與美軍嫖客站在同一陣線上而形成跨種族男性同盟，亦即臺灣男性經營者樂於打造本國女性成為暢銷商品以行銷販賣國際。

同樣的題材到了曾心儀筆下，卻有別於黃春明小說裡高朋滿座的美軍，她選擇將時間點落在越戰尾聲的蕭條酒吧，<sup>76</sup> 十分符合她關注弱勢與邊緣者的胸懷。〈閣樓裏的女人〉就以「駐臺中的美軍撤走了，那兒的酒吧都關門」點出臺灣吧業的逐漸萎縮，<sup>77</sup> 吧女必須北漂才得以餬口的困窘；到了〈酒吧間的許偉〉就正式宣告酒吧是黃昏產業：

現在臺北的吧業凋零，代之而起的是酒店、餐館。自從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駐臺美軍一批批撤走。原本以美軍為對象的  
吧館如今都是透支、不能維持的景況。<sup>78</sup>

<sup>73</sup> 朱惠足，〈台灣與沖繩小說中的越戰美軍與在地性工作者：以黃春明〈小寡婦〉與目取真俊〈紅褐色的椰子樹葉〉為例〉，收入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年），頁245。

<sup>74</sup> 以下可見謝世宗，〈跨國資本主義與理性精神：論王禎和與黃春明筆下的中小企業主原型〉，《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頁147-163；〈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臺灣社會顯微：重讀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171。

<sup>75</sup>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234。

<sup>76</sup> 1972年，美國宣布美軍官兵停止來臺度假的招待事宜後才開始逐漸減少美軍人數，迄1979年中美斷交為止。柯瑞明，《臺灣可以說不》，頁28。

<sup>77</sup> 曾心儀，〈閣樓裏的女人〉，《我愛博士》，頁82。

<sup>78</sup> 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我愛博士》，頁33。

人不敷出的酒吧本應推出更多新奇的行銷方案以吸引美軍再來消費，才能解決吧女們急需賺錢養家的生活困境。但曾心儀卻反其道而行，安排年輕男性不得不接下病危父親的工作，百般不願的成為吆喝美軍消費的皮條客。男性對於此舉感到侮辱難堪，但又得屈服於生活現實，內心矛盾掙扎、痛苦不已：

許偉落在極痛苦的情緒裏。為什麼要賣身來換取生活呢？為什麼維持一個基本生存是這樣的困難？他雖然已經由於父親病危的樣子而改變心意，來店裏幫忙——這不是一、兩天的事；他卻怎麼樣也不能停止思想的衝突、掙扎，良心的譴責。

我要在這個環境裏打出一條路來，讓女子們保有尊嚴，萬一生意受到影響，只求能維持基本開銷。我要以女子們的尊嚴、意志為主。絕不為了店裏的利益而苛求她們做她們不願意的事。<sup>79</sup>

許偉不似〈小寡婦〉、《玫瑰玫瑰我愛你》的男性經營者戮力於行銷跨國色情生意，絞盡腦汁於如何讓業績長紅以賺取最大利潤，反倒是顧及女性尊嚴，只求能打平酒吧的基本開銷與吧女的生活費。甚至屢次斥喝、扭打並轟走凌辱吧女的美軍嫖客，即便生意一落千丈也在所不惜。顯見曾心儀正是出自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識構思，有別於王德威直指黃春明「獨獨犧牲了對女性尊嚴的直接探討」。<sup>80</sup> 也就是在維護女性尊嚴的前提下，曾心儀小說中的本國男性經營者不再與美軍嫖客站在同一陣線，不再主動對美軍獻出同族女性的身體，甚至抵抗反擊。曾心儀勾勒出的男性皮條客形象，便不是邱貴芬所謂「被閹割去勢的男人」，<sup>81</sup> 也不是朱惠足所稱「『自我去勢化』、『自我陰性化』，甚至

<sup>79</sup> 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我愛博士》，頁 28-29。

<sup>80</sup> 王德威，〈尋找女主角的男作家：茅盾、朱西寧、黃春明、李喬〉，頁 34。

<sup>81</sup> 邱貴芬，〈性別／權力／殖民論述：鄉土文學中的去勢男人〉，《仲介台灣·女人》，頁 178-200。

不惜藉由『自我死亡化』的臺灣男性，而是在陽剛氣概的男性形象下，進而切斷臺灣在地男性與美軍形成的跨種族男性同盟，亦即跨國父權締結的共犯關係。<sup>82</sup> 若自經濟與交換的角度審視，殷寶寧指出被殖民者男性不再將女性視為「資源」販賣、作為輸誠的貢品交易給殖民者，也就意味著拒絕進入殖民者象徵秩序的權力運作機制中。<sup>83</sup> 但不勝唏噓的是，堅持捍衛女性性工作者尊嚴的許偉，最後仍無法顛覆跨國父權的殖民經濟秩序，只能扛著行李黯然離開吧館。

跨種族男性同盟之所以難以顛破，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學者所謂在父權與資本主義兩個體系交互運作下，婦女受壓迫的物質基礎（material base），致使男性始終控制著女性的勞動力外，<sup>84</sup> 更指向這些男性經營者不過是遂行國家機器的運作而已。曾心儀就描寫日本觀光客在百貨公司裡拿著觀光手冊，公然向臺灣少女尋花問柳的過程：

一位西裝革履的年輕男子，默默笑著，走近少女們，將一本小冊子遞給其中一位少女。……原來這是觀光客用的手冊，上面有日文、英文、中文三種字互相對照，寫著各種有關吃喝玩樂的事項。首先就標明著「我是日本人」、「我住在金城飯店——二房」、「妳願意和我做朋友嗎？」

黃明明忿忿地說：

「真不知道是那個缺德鬼替這些外國人印這樣的冊子！」

<sup>82</sup> 朱惠足，〈台灣與沖繩小說中的越戰美軍與在地性工作者：以黃春明〈小寡婦〉與目取真俊〈紅褐色的椰子樹葉〉為例〉，收入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頁 245-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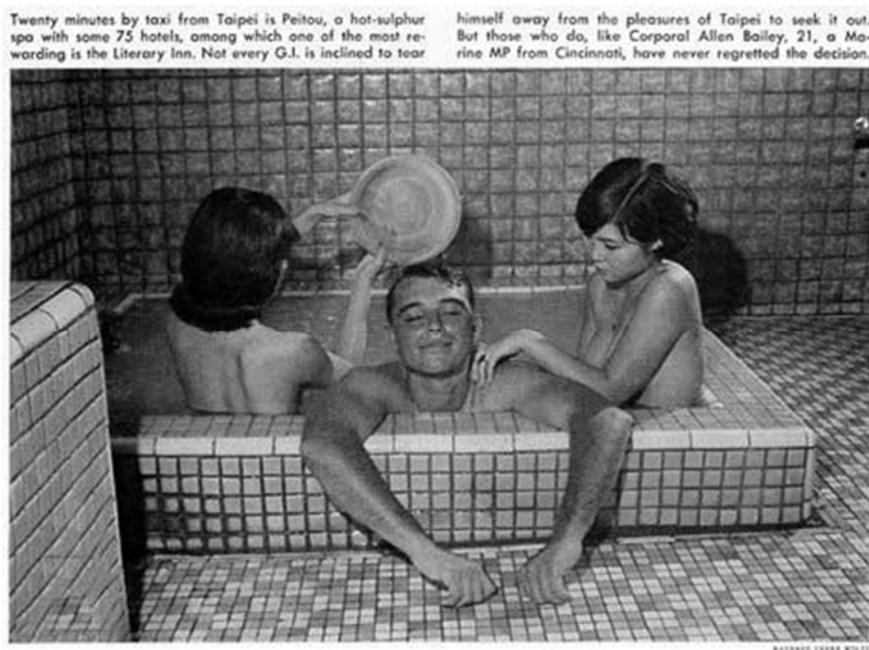
<sup>83</sup> 殷寶寧，《情欲·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頁 105。

<sup>84</sup> 黃淑玲，〈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收入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事業公司，1996 年），頁 48。

「日文、英文、中文都有了，外國觀光客都可以用這個冊子找中國女孩了！」

「真絕！吃喝玩樂的句子都有了，連渡夜資也寫得清清楚楚。這些人都像畜生！」<sup>85</sup>

雖然此處是以「不知道是哪個缺德鬼」公然為日本人印製買春觀光手冊的提問，但我以為曾心儀企圖指涉省政府在 1972 年發行的英文觀光指南裡，就印製了兩位北投女侍者全身裸露、殷勤地為美國大兵洗澡的鴛鴦戲水照，用以宣傳來臺度假觀光的事實：<sup>86</sup>



圖一：美軍北投出浴圖

<sup>85</sup> 曾心儀，〈窗櫺裡的少女〉，《那群青春的女孩》，頁 219-220。

<sup>86</sup> 詳見殷寶寧，《情欲·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頁 115-118。

此照片原刊登在 1967 年 12 月 22 日的美國《時代周刊》上；這一當年造成國際轟動的事件就被黃春明寫入〈小寡婦〉，以強調廣告行銷的重要性。<sup>87</sup> 然而重點是，政府以此印行的英文觀光解說指南就像色情刊物的誨淫文句，而該書前面還有歷任省主席的序言和簽名。<sup>88</sup> 事實證明當年為了追求觀光經濟的外匯需求，由國民政府推出臺灣女性服侍西方男性的「正當」畫面，誠如《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董斯文所言「各位同學能在這麼空前完美的地方為美軍服務，為國家賺取外匯，真是有福」，<sup>89</sup> 似乎意味著臺灣的存在必須透過美國的寵幸才得以彰顯，國民政府的自我矮化，不啻是東方主義自我內化後的展現。<sup>90</sup> 諷刺的是，國民政府在檯面上大喊掃蕩私娼，<sup>91</sup> 但檯面下卻是默許甚至鼓勵酒吧業主動提供女體。此舉確實為臺灣帶來了豐厚的外匯，<sup>92</sup>

<sup>87</sup> 黃春明〈小寡婦〉中提及：「北投有一家 Literary Inn，小姐跟美國人陪浴的消息，圖文並茂地刊在 Time，一時真的轟動武林，驚動萬教起來，之後接了不少美國人的生意。」見黃春明，〈小寡婦〉，《看海的日子》，頁 167。

<sup>88</sup> 歷任省主席的序言與簽名為：謝東閔（1908-2001）、陳大慶（1904-1973）、黃杰（1902-1995）。再者，根據考證，男主角 Allen Bailey（1945-1966）生於 1945 年 8 月 31 日，在美軍第七陸戰團第二營服役的他，早已在 1966 年 3 月 4 日，美軍在越南廣義省發動的「猶他作戰行動」（Operation Utah）裏，搭 UH-1E 直升機進入戰場時因槍傷陣亡了。詳見殷寶寧，《情欲·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頁 115-118。

<sup>89</sup>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頁 219。

<sup>90</sup> 有關「東方主義的自我內化」的概念來自坪井秀人的一篇文章。文中述及北原白秋（1885-1942）在作品中表現出對南蠻文化（十六世紀葡萄牙、西班牙等國）中的東方主義內化的問題。詳見〔日〕坪井秀人著，吳佩珍譯，〈作為表象的殖民地〉，收入吳佩珍主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中冊，頁 167-208。

<sup>91</sup> 這可從同樣在 1972 年 7 月《台灣婦女月刊》刊出「全省婦女同胞，全力支持政府整肅社會秩序的新措施，共同來維護社會安寧，轉移社會風氣」可知。見臺灣省婦女會編，〈我們的話：整肅社會秩序，轉移社會風氣〉，《台灣婦女月刊》第 193 期（1972 年 7 月），頁 2。

<sup>92</sup> 鍾俊陞文中提及：「以美軍投入越戰人數最多的 1970 年代初年，估計有 20 萬美軍來台，身上有一年的薪水 12000 美元，以其中 5000 美元花在台灣（據當時酒吧業者說來台美軍世紀末似地花盡口袋裡的錢才走）的話，就有 10 億美元的外匯。」詳見鍾俊陞，〈台灣的娼婦

柯瑞明就戲謔的說「出賣性器官給美軍使用的酒吧女，是創造臺灣經濟奇蹟最偉大的功臣」。<sup>93</sup> 在國家的推波助瀾下，臺灣「色情工業」蓬勃發展，性工作者成為一種專屬的特種職業，間接促成色情地位的「正當化」；<sup>94</sup> 探其因，臺灣政府在 1960 年代「面臨國際政治的承認危機之際，國家機器亟欲藉由加強經貿發展與觀光事業來取代日益崩潰的國際地位」。<sup>95</sup> 而曾心儀在小說中述及臺灣隨處可見色情觀光手冊，並以「真不知道是那個缺德鬼替這些外國人印這樣的冊子」、「這些人都像畜生」的對話，<sup>96</sup> 正是某種程度批判了跨種族男性與國家機器的結盟。

#### 四、隱喻獨立自主的國族寓言

臺灣以女性性工作者為題材的寓言書寫現象，與臺灣長期處於被殖民的蹂躪剝削狀態有很大的關係。邱貴芬以 Louis Montrose 之說述及自十六世紀英國殖民思考體系裡，土地藉由一種轉喻修辭，被性別化為宛若處子之女體，殖民行為被喻為「開墾處女地」，展現一國「雄風」的男「性」能力。<sup>97</sup> 雖然臺灣殖民史脈絡與西方不盡相同，但謝世宗已指出在清代文人的遊記中，臺灣就常以女人國的形象出現，同樣將臺灣／土地／殖民地女性化。<sup>98</sup> 更在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經濟——戰爭色情與貿易色情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頁 73。

<sup>93</sup> 柯瑞明，《臺灣可以說不》，頁 22。

<sup>94</sup> 林以青，〈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以七〇年代的台北為例〉，收入鄭明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頁 74。

<sup>95</sup> 殷寶寧，《情欲·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頁 110。

<sup>96</sup> 曾心儀，〈窗櫺裡的少女〉，《那群青春的女孩》，頁 219-220。

<sup>97</sup> 邱貴芬，〈性別／權力／殖民論述：鄉土文學中的去勢男人〉，《仲介台灣·女人》，頁 181-182。

<sup>98</sup> 謝世宗，〈男性氣質與台灣後殖民小說中的慾望經濟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9 期（2009 年 10 月），頁 41-42。

所謂「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的論點下，<sup>99</sup> 詮釋者往往將小說中女性性工作者卑賤的身分與臺灣被殖民的歷史記憶繫聯，產生「妓女／被殖民者」、「嫖妓者／殖民者」的二元對應符碼。這一類小說揭示臺灣被殖民歷史的基本經濟模式，多將女性性工作者當作商品推銷給美軍及日客，以外國嫖客來臺買春作為新殖民主義的隱喻。

自 1975 年開始投身黨外民主運動且具強烈使命感的曾心儀，<sup>100</sup> 有三篇以女性性工作者投射國族寓言：〈彩鳳的心願〉、〈那群青春的女孩〉、〈朱麗特別的一夜〉。這三篇作品的女性截然不同於〈小寡婦〉、《玫瑰玫瑰我愛你》將臺灣女體化為一主動獻媚的性工作者，也一反以戲謔手法反諷向殖民資本主義靠攏的寓言模式，反倒極其嚴肅地描寫女性反對成為性工作者，及離開性工作後決定獨立自主的故事。若被迫居於依賴、邊緣地位的群體都可視為被殖民者，<sup>101</sup> 那麼，當女性性工作者不再依賴買春客的經濟殖民，已可嗅出曾心儀隱喻獨立自主的國族寓言。

1970 年後日本買春團大量以觀光之名來台，恰巧接軌因越戰接

<sup>99</sup> [美]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著，張京媛譯，〈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馬克思主義：後冷戰時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93。

<sup>100</sup> 由廖建華導演耗時四年拍攝黨外民主運動的紀錄片《狂飆一夢》，主角之一就是曾心儀 (另一位是康惟壤)。此片於 2020 年 3 月 6 日上映。廖建華，《狂飆一夢》，<https://docs.tfi.org.tw/zh-hant/film/6219>，瀏覽日期：2021 年 12 月 21 日。紀錄片後出版成書：廖建華、何孟樺編，《狂飆一夢：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臺北：前衛出版社，2020 年)。另曾心儀參與黨外運動的相關著作可見：曾心儀，《心內那朵花——台灣民主運動的文學紀事》(臺北：新風格文藝出版社，2000 年)，另外兩部長篇小說可見以下：曾心儀，《走進福爾摩沙時光步道》(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06 年)；曾心儀，《福爾摩沙紅綠繽紛》(臺北：遠景出版社，2010 年)。

<sup>101</sup> 邱貴芬，〈發現臺灣：建構臺灣的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2 期 (1992 年 7 月)，頁 153。

近尾聲而逐漸撤離臺灣的美軍，將臺灣情色工業再推向第二波高峰。根據統計，1970年日本入臺遊客達539755人，觀光外匯收入1億1千萬元臺幣，為臺灣賺進大筆外匯。<sup>102</sup> 曾心儀就指出「以前，酒店專做美國在臺駐軍的生意。現在美軍很少了」、「要改學日語。現在日本觀光客很多」的變化。<sup>103</sup> 描寫日本買春客來臺最經典的作品當是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七名日本商人組成「千人斬」俱樂部，由臺灣男性黃君帶他們在臺灣歡樂買春行。黃君初接獲上司命令時，在國族主義的仇恨痛苦中想起南京大屠殺的故事：

當時這位南京人的歷史老師，拿出外國雜誌上的圖片，讓我們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鏡頭；我們看到被砍首的中國人，被刺刀刺進肚子的孕婦，其中最最難忘的是，一群中國人緊緊地手牽手，有的母親緊緊地抱著孩子，走下土坑被活埋的場面。記得當時看了這些圖片，整個身體都變得像石頭一般的僵化了。我們一邊含著眼淚聽鄒老師講，一邊在心裏還恨自己的年齡沒能趕得上八年抗戰，去找日本鬼子為我們同胞報仇。<sup>104</sup>

黃君雖懷有國族主義，但最後卻不得不在階級與經濟壓力下，迫使他接下這份拉皮條的工作。<sup>105</sup> 若從這篇小說設定的時間點在1972年6月，<sup>106</sup> 已歷經釣魚臺主權爭議（1970年9月）、喪失聯合國席位（1971年10月），時值中華民國處於國際上難以定位的矛盾處境。Ron S. Judy 就指出，小說中黃君內在的矛盾隱喻不被國際承認的臺

<sup>102</sup> 鍾俊陞，〈台灣的娼婦經濟——戰爭色情與貿易色情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頁76。

<sup>103</sup> 曾心儀，〈那群青春的女孩〉，《那群青春的女孩》，頁34-35。

<sup>104</sup> 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莎啞娜啦·再見》，頁13。

<sup>105</sup> 見謝世宗，〈女性化主義與男性氣質的多重面向：臺灣鄉土小說中的慾望經濟學〉，《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頁49-51。

<sup>106</sup> 日本客人於1972年5月30日有3名日本人在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進行恐怖攻擊事件後的一個月來臺。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莎啞娜啦·再見》，頁23。

灣，只能退縮到自己的小島角落裡繼續「丟面子」，因為國民黨政府為了賺取外匯，卻仍然必須擴大與日本間的經濟往來獲取利潤，無疑是一種矛盾的內在凝視，<sup>107</sup> 黃春明對千人斬團的命名，無疑是將買春客的陽具等同於武士刀，以隱喻日本對臺灣的經濟殖民。至於小說中這群女性性工作者的嘻笑展演，謝世宗以為是「昧於商品拜物，既無任何的民族榮耀（national pride），也不在乎自己的身體被異族入侵」。<sup>108</sup> 其實不僅女性性工作者，文末的皮條客黃君正帶著「千人斬」買春團搭乘前往花蓮的火車，猶如遭去勢（女性化）的臺灣男性為迎合日本經濟體，不惜出賣臺灣女性的身體。Rosmary Haddon 就從國族寓言的層次指出，臺灣成為日本買春之旅的一個停靠站或招待國，顯見小說中的臺灣性別化來自於它作為一個從屬或附庸國家的地位，<sup>109</sup> 指向臺灣必須仰賴外匯而形成另一種新殖民主義的事實。

此題材在曾心儀〈彩鳳的心願〉則交由女性召喚出「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其實，〈彩鳳的心願〉創作的主要目的是揭發百貨業惡劣的勞動環境及資方的壓榨剝削，<sup>110</sup> 作者僅在文末的一小節略述女主角險遭被騙賣身之際，眼前浮現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後就戛然而止。雖然沒有太深入的情節，但兩篇相同的歷史記憶卻值得並置討論。故事場景從百貨公司展開，櫃姐彩鳳因才貌出眾，在經濟壓力下參加歌后選拔競賽，希望一舉奪冠後的名利雙收得以改善家計。爾後卻遭酒

---

<sup>107</sup> Ron S. Judy, "The Pathos of Patriotism: Nativism and the Nationalist 'Faciality Machine' In Huang Chun-ming's *Sayonara, Zaijian!*," *The Wensha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2 (Jun. 2016): 76-78.

<sup>108</sup> 謝世宗，〈經濟論述、大眾消費與進口現代性：臺灣殖民經濟小說及其性別次文本〉，《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頁 92。

<sup>109</sup> Rosemary Haddon，〈拉皮條與順從：黃春明小說中被出賣的身體〉，收入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42。

<sup>110</sup> 詳見戴華萱，〈勞動與性別——楊青矗與曾心儀的女性勞工書寫比較與對話〉，《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31 期（2020 年 10 月），頁 153-189。

店老闆看上，誘騙她轉至酒店上班，原以為要當歌手，未料卻被派往賓館以性交易接待日本客人，小說最末就停格在彩鳳不願成為性工作者的僵局：

到這時，彩鳳才搞清楚了這是怎麼回事！……她心裏打定主意，讓蔡先走，等蔡走了，她再開溜。想到這裏，不禁眼鼻發酸……

蔡走了。蔡把門帶上。彩鳳和日本人遙遙對峙站著。

日本人貪婪地看著彩鳳。

彩鳳冷冷地看著日本人。她眼前幌過一幀舊時的照片，人物明晰——

路邊的刑場

雙手被反綁，跪在地上的中國人民

被砍去頭顱，平平的頸面

日本軍閥手持彎彎、亮光光的武士刀

頭顱在武士刀邊，臨在空間

是怎樣痛苦、無言的臉顏啊，那臨空的頭顱上<sup>111</sup>

當彩鳳意識到老闆交派的工作竟是為日本客提供性服務時，南京大屠殺的殘虐畫面立即浮現彩鳳腦海，以此指向日本人長期以來不斷以武力、經濟欺凌中國人的殖民史。小說最後留下開放式結局，雖然沒有明確說明彩鳳做了什麼選擇，但從這段敘述的「打定主意」、「開溜」、

---

<sup>111</sup> 曾心儀，〈彩鳳的心願〉，《彩鳳的心願》（臺北：遠景出版社，1978年），頁42。

「遙遙對峙」、「冷冷地看著日本人」的堅決用語，可以預想接下來的故事情節：知道實情後就盤算開溜的彩鳳勢必不會順從，以嚴肅的態度看待自己身為女性的身體，據此凸顯女體的不容侵犯；顯然很不同於〈莎啞娜啦·再見〉以嘻笑怒罵手法描寫那群爭相與日本客進行身體交易以獲取高額報償的女性性工作者。誠如 Rosemary Haddon 所論，當女性與性別的議題被納入國族論述的框架內，被出賣的身體也成為被出賣的國族象徵。<sup>112</sup> 那麼，黃春明那些出賣女體的小說象徵持續被佔據與剝奪，就道出臺灣仍必須依附經濟他者的事實。同樣面對向來被視為外匯恩客的日本經濟主，曾心儀筆下不願服從的女性隱寫出抵抗新殖民主義、不依附日本的自主寓言。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小說都以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彰顯國族（中國）意識，王梅香自美援文化深耕臺灣的影響面提出美國以一種「隱蔽權力」(Unattributed Power) 的姿態協力國民政府建構中國文化的正統地位；<sup>113</sup> 蕭阿勤也指出七〇年代本省籍作家雖然懷抱臺灣本土認同，但在黨國教育下，仍必須展現中華民族意識；直到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才無法相容。<sup>114</sup> 黃春明和曾心儀同樣描寫七〇年代日本買春客對臺灣進行的經濟殖民，並召喚三〇年代南京大屠殺的國族歷史記憶，藉由新仇（陽具／嫖妓）舊恨（刀／屠殺）揭示出國族寓言。不同的是，〈莎啞娜啦·再見〉中仍然將女性商品拜物化，男性雖矛盾掙扎，但仍繼續執行皮條客的任務，

<sup>112</sup> Rosemary Haddon, 〈拉皮條與順從：黃春明小說中被出賣的身體〉，收入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27。

<sup>113</sup> 詳見王梅香，《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 年）；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68-71。

<sup>114</sup> 蕭阿勤，〈確立民族文學〉，《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年），頁 158-230。

指涉臺灣必須依靠外匯而不得不成為日本經濟殖民地的事實；但〈彩鳳的心願〉則以嚴肅的態度看待女體，女性不願為了經濟利益出賣身體，心境上也沒有絲毫的矛盾拉扯，並選擇與日本尋春客對峙，隱隱展現出不願依附日本經濟體的獨立國族意識。

無庸諱言，戰後臺灣經濟體的穩定與復甦，確實受到美援很大的幫助，而中美協防條約是在美蘇對峙下，美國為避免全球遭共產赤化而簽訂。但戰後持續三十年的冷戰，以及援外經濟的龐大負荷延緩美國資本主義的拓展；1970年後全球冷戰體制逐漸破冰，在美方盤算資本主義利益最大化的野心下，屈居小島的中華民國在國際上逐步孤立無援。自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次後，中華民國代表一個中國的合法性消失，最後在1979年中美斷交正式進入孤立時期。這些外交重挫也迫使具使命感的知識分子重新思索「中華民國」的主體性，就有一群人透過政治的方式提出訴求。在當時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戒嚴時期，不畏生命危險的以黨外人士身分參與各種社會運動；<sup>115</sup> 曾心儀就在1975年投入，舉凡黨外人士的選舉助選、抗議遊行、編黨外雜誌、聲援蓬萊島案、高雄事件都可以看到曾心儀的身影。<sup>116</sup> 中美斷交的1979年，曾心儀創作〈那群青春的女孩〉、〈朱麗特別的一夜〉，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篇同樣是美國大兵與女性性工作者的故事，但卻都描寫女性決心離開性工作後，堅定地選擇獨立自主的生活，由主張臺灣「本

<sup>115</sup> 1969年，黃信介（1928-1999）與康寧祥當選改制後的臺北市第一屆市議員與立法委員，是70年代黨外反對政治運動的開端，1975年至1978年，許多回歸現實的戰後世代知識分子相繼投入黨外運動。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0年），頁264-342。

<sup>116</sup> 曾心儀，《心內那朵花——台灣民主運動的文學紀事》，頁83-159。另，值得一提的是，此書的目錄前有許多曾心儀參加民主運動的珍貴照片，如與陳水扁、呂秀蓮、黃信介、謝長廷、陳菊、南榕嫂、李筱峰的合影，以及高雄事件、鄭南榕（1947-1989）事件、黨外助選團及記者會、聲援美麗島受難人絕食等珍貴照片。

來就在世界宇宙中有她的獨立尊嚴」的曾心儀寫來，<sup>117</sup> 似已可窺見她在 1970 年代已隱喻臺灣應朝向獨立的國族寓言。

曾心儀在自序中特別提及〈那群青春的女孩〉寫於中美斷交後，並以「對於愛這塊鄉土的中國人來說，只有在逆境中堅忍、勇敢、樂觀地往前走——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的自我喊話，<sup>118</sup> 可見曾心儀是有意識的設定小說的時間點。文本脈絡很簡單，主要描述從事性工作的小霞與美國大兵湯姆未婚生女後，萌生是否要移居美國的內心掙扎。故事從機場送行展開，深愛小霞的湯姆準備返美執行軍務，並等候小霞母女辦妥護照後赴美團聚。從小霞備受湯姆寵愛的情節推想，到美國後應當得以享有衣食無虞的生活，一如施淑所論這群女性工作者無不希望能遇見值得託付終身的外國客，「最好是名字本身就保證著美好生活的美國」。<sup>119</sup> 但小說卻不斷出現小霞因為湯姆的美國籍而猶豫婚約：

看著他微卷、金黃色的頭髮，不禁感喟著她的際遇像一場夢。  
……他確是一個好伴侶；除了國籍的問題以外。小霞常常想：  
如果他是中國人，那麼這個愛情，這個婚姻對他來說就毫無疑慮了。<sup>120</sup>

一反當時女性崇洋媚外的常態，湯姆的美國籍竟是讓小霞對婚姻卻步的主因。其實細讀後發現，曾心儀在小說中早已埋下多處伏筆。首先，在機場分離時，小霞對湯姆說「沒有你，我也要生活呀！」爾後小霞想起未婚夫時總是惶亂、惆悵、憂愁，並且在酒店姊妹淘說出「聽說，

<sup>117</sup> 曾心儀，〈愛台灣這條路〉，《走進福爾摩沙時光隧道》，頁 6。

<sup>118</sup> 曾心儀，〈自序〉，《那群青春的女孩》，頁 3。

<sup>119</sup> 施淑，〈愛麗絲遊記——曾心儀集序〉，見曾心儀著，施淑、高天生主編，《曾心儀集》，頁 11。

<sup>120</sup> 曾心儀，〈那群青春的女孩〉，《那群青春的女孩》，頁 3。另有兩處提及國籍問題，分見曾心儀，〈那群青春的女孩〉，《那群青春的女孩》，頁 22、30。

美國要和中共建交」，催促小霞儘速赴美，小霞卻說出「臺灣就像個小船在海上漂盪」的擔憂，並回以「到了美國，人家說，他愛洋婆子，我們能怎麼辦？」<sup>121</sup> 似乎是自美國男性移情別戀的想像，暗喻長期支援臺灣的美國琵琶別抱，隱涉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的孤立無援。另一方面，在受到兒時同伴關心社會議題與熱愛本土的啟蒙下，<sup>122</sup> 小霞不僅回彰化老家進行一場鄉土巡禮，決心只嫁中國人並留在臺灣。小霞不再從事性工作，也找了份勞力活以自給自足；雖然勞碌疲累，但卻能以一種有尊嚴且心安愉快的方式養活女兒：

她像一個大夢初醒的人，有著虛弱的感覺。她必需振奮，重新開始，為了自己，為了女兒的前途，她必需要採取一種獨立、有尊嚴的謀生方式；這就是她目前最大的願望。

這種經過自己檢視自己的喜好，經過安排的生活，不管它是多麼地平淡、簡單，而且在物質上有點缺乏，須要勞累，畢竟它已成她的生活中最基礎的部分。她覺得心安而愉快。<sup>123</sup>

小霞決定獨立自主的過程，包括兩個階段。首先是離開酒店後不再從事性工作。但從她本將隨湯姆回國可推知，沒有其他專業技能的小霞定居美國後勢必被迫居於依賴、邊緣的地位，仍然是美國男性的經濟附庸。第二個階段是小霞決定取消婚約，留在臺灣靠一己之力撫育孩子。如果回溯 1950 年代因美援而建構出崇美的社會意識，再自 1965 年越戰美軍以臺灣為度假中心後帶來的鉅額外匯，確實可將美國比擬為給予臺灣經濟救援的恩客。以美國男性是經濟殖民、臺灣女性是經

<sup>121</sup> 以上分見曾心儀，〈那群青春的女孩〉，《那群青春的女孩》，頁 5、40-41。

<sup>122</sup> 曾心儀在〈那群青春的女孩〉寫道：「他們對居住本土所抱的肯定的態度，對她造成一種刺激，刺激她再一次正視她在婚姻上所面臨的困惱——她能嫁到美國去，長期住在那裏嗎？」見曾心儀，〈那群青春的女孩〉，《那群青春的女孩》，頁 21。

<sup>123</sup> 以上分見曾心儀，〈那群青春的女孩〉，《那群青春的女孩》，頁 56、64。

濟附庸的轉喻，那麼當從事性工作的女性決定擺脫成為附屬品，正是指涉美國在 1979 年轉而承認中共政權後，臺灣必須獨立自主的國族寓言。

從當時仍處戒慎恐懼的寫作環境（與「美麗島事件」同年）推測，曾心儀無法在小說中太過明指，只能以小霞不再從事性工作，且與美國未婚夫解除婚約的自我決定，隱隱投射出獨立國族寓言的暗喻，這已經和黃春明〈小寡婦〉展現出對美國的崇洋現象截然不同。〈小寡婦〉讓女性身體歡迎美軍的到來，仍希望受到美方的青睞，這也就如 Rosemary Haddon 所謂「這樣的身體本身是一種轉喻，象徵著在歷史上持續被佔據、剝奪與孤立，也就是被出賣的國家」，<sup>124</sup>〈小寡婦〉中的女體持續被殖民、被物化與被收編，不同於曾心儀筆下決定獨自展開新生活的女性所隱喻獨立自主的國族意識。

〈朱麗特別的一夜〉同樣是美軍來臺渡假尋歡的故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是曾心儀唯一描寫美軍性暴力與性虐待的一篇。朱麗因為亨利長相酷似某位美國電影明星，以及出手慷慨而心生愛慕。未料帶出場後，酗酒的亨利竟然轉而面目猙獰、眼露凶光，甚至恣意謾罵、脾氣暴虐，驚嚇不已的朱麗想方設法逃出，卻因此激怒了亨利對她施予性暴力：

她的後頸被一隻強有力的手緊緊捏住。她側過頭，看到裸身的亨利，他的臉孔兇猛、憤怒的像隻準備食人的獸。……他把她推到床上，對她怒吼：「妳不准走！妳永遠不准走出這個房間！」……他把握在手中的鈔票遞近她的面前，語無倫次地說：「你們喜歡美金，是不是？你們喜歡美金甚於新台幣是不是？」他一邊說著，鬆開手指，任鈔票飄落在床上和地上。……

<sup>124</sup> Rosemary Haddon，〈拉皮條與順從：黃春明小說中被出賣的身體〉，收入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54。

是一個齷齪、罪惡、卑下、醜陋的野獸凌辱著她，如撒旦化身的蛇妖，銜著牠的所有罪惡，鑽行到她的體軀裏。在凌辱中，她正視著自己的卑微。<sup>125</sup>

雖然曾心儀在 1979 年前或有述及女性性工作者遭受欺凌，但都僅於調戲、輕視玩弄、侮辱（凌辱、羞辱）的字眼，〈酒吧間的許偉〉將情節止於「秀英差點被鬼子打」，<sup>126</sup> 並未真正發生性暴力。而〈朱麗特別的一夜〉寫於中美斷交那一年，亨利的嫖妓行為，隱含了以暴力刺穿女體的欲望；在性別暴力的層次，男性都將女性視為慾望的客體，表現男性對女性的控制欲。在殖民地女性化的國族寓言，臺灣的性別化，來自於她作為一個從屬或附庸國的地位，自美國執行冷戰策略、美援的同時，也將臺灣視為越戰美軍休憩的樂園，據此強制執行一連串的休閒娛樂政策，正是由國家核准、許可的賣淫事業。爾後在跨國投資階段，更將臺灣視為貨物集散地或轉運中心。美國投入大額資金援助的同時，也近乎強迫性佔有臺灣的資源。顯見曾心儀將美軍的性暴行隱涉美國自冷戰策略以來，將臺灣強行視為執行越戰、資本主義擴張等慾望的客體，也暗指美國於 1979 年片面決定與臺灣斷交的粗暴決定。中美斷交促使知識分子思索的是：如何以「中華民國」之名，在國際社會中繼續生存下去？曾心儀安排讓遭遇性虐待後的朱麗決心從良展開新生活，隱喻臺灣不再依賴美國經濟援助與政治支持後必須獨立的國族寓言。若後設地自曾心儀於 1987 年聲援許曹德（1937-2018）、蔡有全（1951-2017）臺獨案，以及 1998 年披上建國黨的戰袍參選立法委員，在《狂飆一夢》的紀錄片中也可以看到曾心儀綁著「臺灣獨立」頭帶的堅定身影，揭示政治的曾心儀日後明確支持臺灣獨立的主張，而文學的曾心儀則早在寫於 1979 年的〈那群青春的女孩〉、

<sup>125</sup> 曾心儀，〈朱麗特別的一夜〉，《等》，頁 175-179。

<sup>126</sup> 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我愛博士》，頁 29。

〈朱麗特別的一夜〉中以女性離開性工作後獨立自主的生活，不再成為依附者的經濟自立，隱喻臺灣必須獨立自主的國族寓言。

## 五、結語

具有「弱勢族群代言人」之稱的曾心儀，在以女性性工作者為題材的小說就關注在越戰尾聲，一群沒有出色外貌的邊緣酒吧女。雖然曾心儀反對女性為了支撐家庭經濟而成為性工作者，但對於不得不且已成既定事實者，曾心儀多描寫她們是出自女性自主決定的選擇，而非被迫的當作商品交易。接著，她再自女性性工作者的主體性出發，描寫女性選擇成為性工作者的矛盾心理，道出女性性工作者的各種職業傷害、症狀及感受，以及當她們決心離職重回現實社會後所面臨的困境。在曾心儀筆下，不僅彰顯女性性工作者的主體性，且更立體細膩的揭示其形象與心境，還進一步提出女性性工作者往往為家庭經濟犧牲的反思；以及臺灣 1970 年代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性商品化現象，反映出性工作者成為眾多職業之一的觀念轉變。曾心儀確實有意識的要自創作揭露底層人民的生活及社會現況，十分切合 1970 年代主張反映臺灣現實社會動向、描寫人民真實生活的鄉土文學。

其次，自女性意識構思，曾心儀在思考如何維護女性性工作者尊嚴的前提下，由本國男性的經營者抵抗反擊美軍嫖客，有別於男性作家向來書寫的跨種族男性同盟，切斷了跨國父權締結的共犯關係。此外，曾心儀自國族寓言的投射，一反男性作家雖以嘲諷的筆法，但卻向殖民資本主義靠攏的寓言模式，分別由女性性工作者不依從美國未婚夫以及日本嫖客的決定，與受美軍性暴力凌虐後從良，隱喻獨立自主的國族寓言。誠然男性／女性的定位並不取決於生理構造，但曾心儀以嚴肅的態度看待女性的身體，十分迥異於黃春明、王禎和這些男性作家嘻笑戲謔的書寫筆法。本文正是透過不同性別書寫女性性工作

者的對話、補充，讓女性性工作者的樣貌呈現出不只是單一性別的論述而已。

附錄一：<sup>127</sup>

書名	篇名	備註
《我愛博士》 (臺北：遠景出版社，1977年)	〈從大溪來的少女〉	1976年4月10日。
	〈烏來的公主〉	1976年7月7日。
	〈一個十九歲少女的故事〉	《夏潮》第3卷第3期，1977年9月。
	〈酒吧間的許偉〉	原載《夏潮雜誌》。
	〈閣樓裏的女人〉	
《彩鳳的心願》 (臺北：遠景出版社，1978年)	〈彩鳳的心願〉	《小說新潮》第2期，1977年10月。
《那群青春的女孩》 (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	〈窗櫺裡的少女〉	《工商時報》1978年12月2日—1979年2月14日。
	〈那群青春的女孩〉	《工商時報》1979年8月30日—9月18日。
《等》 (臺北：四季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	〈朱麗特別的一夜〉	《民眾日報》副刊 (1979年11月7日—11月29日)。

(責任校對：黃博英)

<sup>127</sup> 本表依曾心儀《我愛博士》、《那群青春的女孩》、《等》三部小說集所提供的有限資訊製作而成。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明〕程頤、〔明〕程顥，《二程全書》，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 二、近人論著

丁乃非著，黃道明譯，〈成者為妻，敗者妾妓——婚姻轉型與女權演化〉，《中外文學》第49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203-243。

王津平，〈面對嚴肅的現實問題，高揚批判的道德勇氣——「我愛博士」代序〉，見曾心儀，《我愛博士》，臺北：遠景出版社，1977年，頁1-9。

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〇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_\_\_\_\_，《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1950-1962）》，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年。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臺北：洪範書店，1994年。

丘彥明，〈把歡笑撒滿人間——訪小說家王禎和〉，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臺北：洪範書店，1994年，頁253-261。

朱惠足，〈台灣與沖繩小說中的越戰美軍與在地性工作者：以黃春明〈小寡婦〉與目取真俊〈紅褐色的椰子樹葉〉為例〉，收入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年，頁241-271。

何春蕤，〈女性主義的色情／性工作立場〉，收入何春蕤主編，《性工作：妓權觀點》，臺北：巨流出版社，2001年，頁213-254。

\_\_\_\_\_，〈自我培力與專業操演：與台灣性工作者的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1期，2001年3月，頁1-51。

- 呂秀蓮，《新女性主義》，高雄：敦理出版社，1986年。
- 林以青，〈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以七〇年代的台北為例〉，收入鄭明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頁59-127。
- 林芳玫，〈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中外文學》第27卷第1期，1998年6月，頁56-87。
- 邱如君，《李喬《藍彩霞的春天》中娼妓形象與反抗哲學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 邱貴芬，〈發現臺灣：建構臺灣的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第21卷第2期，1992年7月，頁151-167。
- \_\_\_\_\_，〈性別／權力／殖民論述：鄉土文學中的去勢男人〉，《仲介台灣·女人》，臺北：元尊文化，1997年，頁178-200。
- \_\_\_\_\_，〈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上冊，臺北：女書文化事業公司，2001年。
- 施淑，〈愛麗絲遊記——曾心儀集序〉，見曾心儀著，施淑、高天生主編，《曾心儀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頁9-12。
- 柯瑞明，《臺灣可以說不》，臺北：業強出版社，1996年。
- 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
- 殷寶寧，《情欲·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臺北：左岸文化，2006年。
- 高全之，《王禎和的小說世界》，臺北：三民書局，1997年。
- 張家銘，〈色情現象與生活世界：一個分析類型的提出與其意義〉，《思與言》第33卷第3期，1995年9月，頁1-26。
- 梁欣芸，《台灣當代妓女題材小說研究（1960s-1980s）》，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
- 莫那能口述，劉孟宜錄音整理，呂正惠編輯校訂，《一個台灣原住民的經歷》，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年。

- 陳怡臻，《笑的力量——論王禎和《美人圖》與《玫瑰玫瑰我愛你》中的鬧劇書寫》，臺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
- 曾心儀，《我愛博士》，臺北：遠景出版社，1977年。
- \_\_\_\_\_，《彩鳳的心願》，臺北：遠景出版社，1978年。
- \_\_\_\_\_，《那群青春的女孩》，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
- \_\_\_\_\_，《等》，臺北：四季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
- \_\_\_\_\_，《走進福爾摩沙時光步道》，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06年。
- \_\_\_\_\_，《福爾摩沙紅綠繽紛》，臺北：遠景出版社，2010年。
- 曾心儀著，施淑、高天生主編，《曾心儀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
- 曾心儀編著，《心內那朵花——台灣民主運動的文學紀事》，臺北：新風格文藝出版社，2000年。
- 黃小民，《歷史的謊言·鄉土的真實——李喬小說創作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
- 黃春明，《看海的日子》，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
- \_\_\_\_\_，《莎啞娜啦·再見》，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
- 黃淑玲，〈烏托邦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收入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頁27-70。
- 楊翠，〈日據臺灣娼妓問題初探〉，《婦女研究通訊》第32期，1994年6月，頁6-9。
- 廖建華、何孟樺編，《狂飆一夢：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臺北：前衛出版社，2020年。
- 劉至瑜，〈臺灣作家筆下的妓女形象——以呂赫若〈冬夜〉、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和李喬《藍彩霞的春天》為例〉，《臺灣人文》第4期，2000年6月，頁1-20。

- 劉紹銘，《涕淚交零的現代中國文學》，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
- 劉毓秀，〈後現代性產業的慾望機制，及其與後現代及後期資本主義的關聯〉，《中外文學》第31卷第2期，2002年7月，頁39-67。
- 魯迅，《墳》，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89年。
-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0年。
- \_\_\_\_\_，《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
- 戴華萱，〈勞動與性別——楊青矗與曾心儀的女性勞工書寫比較與對話〉，《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31期，2020年10月，頁153-189。
- 謝世宗，〈男性氣質與台灣後殖民小說中的慾望經濟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9期，2009年10月，頁37-67。
- \_\_\_\_\_，《階級攸關：國族論述、性別政治與資本主義的文學再現》，新北：群學出版社，2019年。
- 謝康，《賣淫制度與臺灣娼妓問題》，臺北：大風出版社，1972年。
- 隱地，《六十六年短篇小說選》，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
- 〔法〕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邱瑞鑾譯，《第二性》，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3年。
- 〔日〕坪井秀人著，吳佩珍譯，〈作為表象的殖民地〉，收入吳佩珍主編，《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臺灣文學·文化研究》，中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頁167-208。
- 〔英〕喬治·萊利·斯科特（George Ryley Scott）著，秦傳安譯，《文明的陰暗面：娼妓與西方社會》，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
- 〔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張京媛譯，《馬克思主義：後冷戰時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Haddon, Rosemary，〈拉皮條與順從：黃春明小說中被出賣的身體〉，

收入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0年，頁 423-462。

Judy, Ron S. "The Pathos of Patriotism: Nativism and the Nationalist 'Faciality Machine' in Huang Chun-ming's *Sayonara, Zaijian!*." *The Wenshan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2 (Jun. 2016): 73-103.

### 三、報刊文獻

王德威，〈尋找女主角的男作家：茅盾、朱西寧、黃春明、李喬〉，《聯合文學》第 14 卷第 10 期，1986 年 3 月，頁 23-40。

臺灣省婦女會編，〈我們的話：整肅社會秩序，轉移社會風氣〉，《台灣婦女月刊》第 193 期，1972 年 7 月，頁 2。

鍾俊陞，〈台灣的娼婦經濟——戰爭色情與貿易色情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人間雜誌》第 37 期，1988 年 11 月，頁 73-76。

魏可風專訪，〈黃春明答客問〉，《聯合文學》第 118 期，1994 年 8 月，頁 82-87。

### 四、網路資料

陳燦坤，〈打響西螺七崁，頭崁高鳴過世武術界惋惜〉，《自由時報》，中部地方版，2017 年 2 月 7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76108>，瀏覽日期：2022 年 1 月 28 日。

廖建華，《狂飆一夢》，<https://docs.tfi.org.tw/zh-hant/film/6219>，瀏覽日期：2021 年 12 月 21 日。

## A Study of Female Sex Workers in Zeng Xin-Yi's Novels

Hua-Hsuan Tai\*

### Abstract

This study begins with Wang De-Wei's observation that Huang Chunming's description of female sex workers is based on "male-centered consciousness" and sacrificing women's dignity. It seeks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concerns female writers bring to the topic of female sex workers and differentiate their depictions from those of male writers. The focus of the article is Zeng Xin-Yi's nine novels about female sex workers, and it finds thre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her portrayals and those of male writers. First, Zeng Xin-Yi cares about the subjectivity of female sex workers, describes their ambivalence with sex work, their inner feelings about occupational injury, and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 when they decide to leave sex work and return to society. The images and moods of female sex workers are described in a three-dimensional and delicate manner. Second,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although the main reason why women became sex workers in the 1970s was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it was their own choice and not a result of being forced or sold.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sex that occurred after Taiwan became a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1970s, and provides reflections on women's sacrifices for their families. Finally, speaking from the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Aletheia University

perspective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Zeng Xin-Yi criticized the cross-racial male alliance that Taiwan entered into with the US military and Japan's vacation tourism, and demonstrated an independen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allegory. This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female writers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women'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national fables of male writer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finds that writ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depict female sex workers in different ways, and it thereby achieves the goal of dialogue and supplementation.

**Key words:** Zeng Xin-Yi, female sex workers, gender awareness, cross-racial male alliances, national fables

